

在父亲激励下成长

□ 陈瑞生



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父亲，不仅仅爱自己的子女，而且爱所有革命者的子女。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穷人都能翻身得解放，使天下的孩子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的父亲陈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首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主政江西时，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在长征时，红军留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孩子都找回来。他和副省长兼民政厅厅长方志纯不谋而合，在吉安地区建立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和一所工农速成中学，把这些由穷苦百姓帮助抚养大的孩子，放在这两所学校学习。首先是为这些孩子建立档案，供他们的父母来认领。无父母认领的，视为烈士子弟，留在学校继续培养教育。留校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后，能考上大学的由国家公费培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没有考上大学的，由烈士子弟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统一分配工作。我父亲和方志纯常常到这两所学校看望革命后代。

我就是个被父母找回的孩子。1933年10月，我出生在红都瑞金，1934年10月，父亲留在赣南打游击，母亲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他们离开苏区前，把刚满周岁的我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1949年8月瑞金解放后，父亲才派警卫连指导员，把我从养父家里接回来。当时我的大哥陈永生、大姐陈春生、大妹妹陈宜生，都留在农村，但处境各自不同，一时还未找回来。我的大弟弟陈迪生和小妹妹陈延生在汉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学习。所以，把我找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在父母身边。

我从瑞金农村回到南昌，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同父亲睡在同一个房间。我睡下后，父亲有时过来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脸。一股幸福的暖流，温暖着我的全身。我热泪盈眶，这种喜极而泣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

表达。

此后，父亲外出作报告，或者参加庆祝活动，都会带着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到八一革大作报告，他让我同警卫员坐在一起听他作报告。至于他讲的什么内容，我基本上没有听懂。因为父亲讲的是普通话，而我讲的是赣南瑞金的客家话。父亲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是南下的东北人，我跟他们接触多，后来和他们学了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到八一公园参加一个纪念活动。那时的八一公园很简陋，主席台是用木头、木板临时搭建的。摆放一张桌子，父亲站在桌子前讲话。

父亲要我参加这些活动，就是要我融入新社会、了解新中国，开阔新眼界、增加新知识，包括尽快学会普通话。

母亲对我的关爱主要体现在生活上。我从瑞金回来的第二天，母亲就叫裁缝给我量尺寸，做了一套新衣服，还有一顶帽子。她还带我到胜利路商店买鞋子和生活用品，送我到省军区医院检查身体和治病。刚从农村回来，我几乎全身都有病。沙眼、肺病、寄生虫、营养不良、贫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的身体好多了。一年后，我的个子长到1.70米。

母亲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为我联系了一所小学，插班入学。那是1949

年10月，我们国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老师讲课用的是南昌话，由于语言不通，我完全听不懂，只好退学。回家自学时，看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练习写字认字，不懂就问妈妈。天冷了，母亲给我做了一条棉褥子。这条褥子我一直用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有了工资以后，我才换了被子和褥子。

记得在那年10月下旬，父亲要我陪同去湖南。那时候，湖南刚刚解放，社会治安很不稳定，土匪还不少，公路也不好，一路上全是沙石路面。我们乘坐吉普车和卡车，一路上风尘仆仆，车上的人都很安静，保持高度的警惕。

可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放牛娃，缺乏军事训练，更不懂得军队纪律，一旦内急，我就提出要下车撒尿。父亲说：“不行！这里是山谷，不安全，难免有土匪。憋着吧！”走出山谷，出现了一块平地。我又提出要下车的要求。父亲同意了，大车小车的人通下车方便。之后，上车继续前进。自此以后，只要坐车行军，或者坐车远行，上车前我都不喝水，免得给大家添麻烦。

傍晚到长沙，休息一天后，第二天晚上，我们继续起程坐火车到了汉口。由于工作需要，父亲在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样使我和父亲有了很

多在一起的机会。父亲休息时，让我陪他散步，聊聊天。父亲开会时，让我在卧室的桌子上练习写毛笔字，父亲有空时也会亲自教我如何写毛笔字。父亲的书法很好。

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谭政的夫人王长德办了一所小学，父亲想让我去她那里学习。父亲拉着我的手拜托她，“我这个儿子瑞生，当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把他留给当地老百姓抚养。今年已经整整16岁了，耽误读书了。收下他吧！”

王长德校长爽快答应了。我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语重心长对我说：“瑞生，你到学校要好好听王校长的话，好好学习，赶上去，尽早毕业上中学。”

1950年春天，我和宜生妹妹、广丽表妹一起去汉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读书。入学前，学校出了语文题和算术题让我们答。根据我们考试的结果，指定我上二年级，宜生和广丽则上四年级。因为她们从农村出来之前一直是上学的，而我在农村早就失学了。从年龄来说，我比她们大三岁。这让我感到很羞愧。

人的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通过发奋图强改变的。父亲在我的一把折叠扇面上题了一句语勉励我：“有志者事竟成”。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我们这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后勤行政人员，全部都是军人，只有个别老师是从地方聘请的优秀教师。班主任老师对我特别关照，每当我遇到学习上的困难，她都会不厌其烦地指导我。我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学

习上，学习成绩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我还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老师要我跳班上三年级。我在这个班仍然是年龄最大的，但同学们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哥哥没有任何歧视，还热心帮助我，使我在学习上迅速赶上进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的飞机多次飞到武汉进行轰炸，严重威胁学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同年底，我们学校迁到江西九江的庐山。

父亲对四野干部子弟学校非常关心。他尽地主之谊，凡是王长德校长提出的困难问题，他都热心帮助解决。

我1953年7月从四野干部子弟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入学考试，并被顺利录取了。这所中学是三年制，分文科和理科。我参加文科班的学习。这个学校主要培养参加过工作的工农干部，所以学生年龄都比较大。班长的年龄比我大十几岁。我不到20周岁，成了班里最小的学生。

在这所学校学习时，父亲经常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我寄了一本《马克思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要我好好读这本书，读完以后，传给姐姐、弟弟、妹妹看。父亲希望我们思想和行动上积极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

我在父亲的指导下，经常学习党章，阅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书籍，特别是认真阅读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等，这些书籍大大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激励我不断进步。

通过党组织的培养和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以及我自己的积极努力，1955年12月24日，校党委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和母亲。父亲对我说：“祝贺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是你们六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入党的。希望你戒骄戒躁，不断进步！”

1957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了，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毕业的第一个大学生。

这段岁月转眼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父亲对我的关爱和教育，一直激励我不断成长和进步！我每一个成绩和荣誉的取得，都离不开父亲的关心和激励！尽管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0个春秋了，但我对他的思念和感恩永远无尽！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教授）

红色记忆

想起农家肥

□ 朱硕民

周末开车去农村探亲，看到田间路两边杂草丛生，一片片一簇簇，有的还探头探脑伸到了路上，时常与汽车亲密接触。

又向前走了一会儿，拐了一个弯，看到路边有个村落，树荫下有十来个乘凉的老乡，我就上前询问，为什么不把杂草割掉沤肥呢？有个年轻人快言快语：现在种地都上化肥，不用去沤粪，也不用割草积肥了。老乡的一席话，不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农家肥。

在农村长大，高中毕业后曾返乡务农，我知道农家肥就地取材、自然沤制，成本很低，且含有大量的有机物，是上好的有机肥料，施到地里可以增加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用庄稼人的话说，就是地发虚，出苗壮，庄稼耐旱，还抗病。

说起肥料的重要性，让我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和科技成果，总结出“八字宪法”并写进正式文件，其中肥料被排在第二位。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国家还比较穷，经济也落后，化肥常年紧缺，农作物种植只能靠施用农家肥。

我对农家肥最早的了解，还是上小学时候学的农谚，“积肥如积粮，肥多粮满仓；粗肥是个宝，庄稼离不了。”“土壤要变好，底肥上要饱；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一次，学校组织往地里抬大粪，有个同学嫌脏不愿抬，老师语重心长地批评他，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农家肥的重要性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没有化肥的年代，为了积攒足够的农家肥，人们想了很多简便易行的办法。

那时每年“三夏”大忙刚过，锄过头遍秋，就到了数伏天。生产队往往集中十天半月时间，安排全体社员割草。因为割草没有技术含量，大人小孩都能干，就男女老少齐上阵，手里拿着镰刀、掂着绳子，到地头、路边和沟渠边割草。有些还拉上架子车，跑到县城郊区的菜地、火车站附近的厂区，一割就是几大捆。那些天，每到傍晚时分，都会有成捆成捆的杂草送到牛圈附近，一家接一家过磅称重。收起来以后有专人铡碎，就近倒进生产队那个长宽各二十

米来的粪坑里，撒一层牲口粪，再拉来土沫子掺进去，然后往池子里灌水，最后压上一层土当盖子，让其自然发酵。

此外，还找一些空闲地方，把铡碎的草堆起来积肥。将一些比较肥沃的土掺进碎草堆，边堆积边压实，并加水保持湿润，最后在四周和顶上糊上一层厚厚的麦秸泥，包裹得严严实实，就像给它穿上棉袄一样。我记得，生产队每年都会堆几十个五六尺高的积肥堆儿，像小麦秸垛那样散落在打麦场和大路边，成为农村夏季里的一道风景。秋收以后，慢慢变矮变小的积肥堆儿，已经成为腐熟好的有机肥料，社员们就用牛车和架子车运送到地里，均匀撒开，等犁耙过后，融入到土壤里，供应麦秋两季的庄稼。

生产队还想方设法寻找肥源。当时，铁路两侧有几个大水坑，每隔两年的冬天，就抽干其中一个水坑，组织劳力起污泥。等日晒风干之后，把乌黑乌黑的泥土砸碎，直接当粗粪上地。每年冬闲时候，还让社员们把地头的玉米秆拉回来，铡成二三指的小段，堆在牛屋前的空地上，饲养员每天垫牛圈用。第二年开春以后，再把剩下的拉走填粪坑。

积农家肥这事儿，不仅生产队上心，社员们也很积极。灶火里做饭烧过的草木灰，都舍不得倒掉，那是上等的钾肥。路边沟里的树叶、杂草，都被人拉回垫在厕所里沤粪，就是优质的农家肥。打麦场旁边沟里的沤麦秸、沤豆秧，也被勤快人拾掇得干干净净，拉回家垫猪圈。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我上三四年级以后，学校每年放暑假、暑假、秋假，不是下地拾麦穗，就是割草、放牛，干得最多的还是挎着箩头，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清晨走一圈傍晚走一圈，大街小巷转着拾粪。

土地包产到户的头几年，还能看到积肥的好传统。秋收大忙已过，家家户户起早贪黑往地里送粪，谁家家的地里偶尔没有上农家肥，还会被邻居们嘲笑。但是这种情况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变化，由于工业生产的化肥肥效快、能增产，还省力气，渐渐的农民买化肥成为一种时尚，只要拿着钱，就能买到名目繁多的化肥、农药，甚至还有各种促进生长的激素，农家肥

逐渐被冷落，甚至被抛弃。

看我站在那里发愣，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老乡同我搭起了话，他说：说实话，庄稼人能不知道农家肥的好处？那个时候地里只上农家肥，麦有麦香，瓜有瓜甜，菜有菜味，吃着也放心，可就是产量上不去。上化肥就不一样了，产量能高出一大截子。离这里20里开外有个养牛场，他开三轮车去买过牲口粪，路远价高，不划算。今年村里有人想种西瓜，为了瓜好卖，还专门跑去拉了几车。

过去是自己积肥，现在是掏钱买牲口粪，这世界变化真是快呀。老乡们又七嘴八舌地对我说，如今的农村人居环境经过整治，也和城里差不多了，村上已经看不到粪坑，也没人养鸡养鸭了，更别说养猪了，不少人家的厕所改成了冲便，就连生活垃圾也倒进了垃圾桶。

农村在变，农民也在变。比如，过去是地里种啥就吃啥，自己磨面、蒸馍、擀面条，自己养猪吃肉、养鸡吃蛋，全部是自给自足。现在不同了，磨面、蒸馍、擀面条，已经难觅踪影，传统的磨坊生意萧条，新兴的超市生意火爆，瓜果蔬菜，猪肉羊肉，鸡蛋鸭蛋，连平时经常吃的蒸馍、面条，也是跑到超市里购买。

地里齐腰深的玉米，舒展着翠绿的叶子，长势正旺，可看不到一丝锄过的痕迹。有个老乡说，现在都打除草剂，锄头已经没用了。农业科技进步了，地不用再锄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也成了老皇历。可我担心，单靠化肥和除草剂喂养，土壤会不会板结呢？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农村人家，能养上几只鸡几只鸭，最好再养上一头猪，平时粪便积肥，夏天高温积肥，不仅有生活气息，能滋养耕地，还能留住乡愁，留下乡土的味道，何乐而不为呢？

农家肥，让人难忘；绿色农业，令人向往。



徐勉出淤泥而不染

□ 段培华



地，更是早在西晋的“占田令”就规定，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占十顷。当时，不仅世家大族，凡宗室、公主、王公以至皇亲国戚，都建有大庄园，如南朝萧齐时的竟陵王萧子良，曾在宣城、临城、定陵三县交界地立宅，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徐勉生活的南朝萧梁时代，达官显贵聚敛财富的程度非常高，据《南史·临川靖惠王萧宏传》记载，梁武帝怀疑弟弟萧宏家中私藏大量武器，曾亲自去查看，发现弟弟家的三十余间库房中堆满了铜钱，其余库房中堆满了布、绢、丝、绵、漆、蜜、朱砂、黄屑等物，财物多到难以计数。当时官员经营产业、聚敛钱财极为普遍，徐勉这样品级的官员，可以轻松获取财富。徐勉在《诫子菰书》中提到，当时有人劝他经营牟利：“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对于这些劝说，他始终拒绝，他更看重的是诗书传家。他在《诫子菰书》中说：“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

选官大公无私。徐勉在任吏部尚书时，一天晚上，与门人虞嘉相谈甚欢，虞嘉趁机向他请求出任某官。徐勉回答，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汉代开始到隋唐之前，朝廷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当时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官员推荐即可做官，魏晋南北朝正是这一制度的盛行时期。朝廷重臣可以合法

推荐人才，许多人也喜欢依附于高官权贵身边。如果累世高官，家族依附的门生无数，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四世三公，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到了徐勉所处的时代，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宋书·颜竣传》说南朝刘宋的颜竣，“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宋书·徐湛之传》说徐湛之“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这些投奔而来的门生，大多希望能得到推荐、照拂。徐勉身为吏部尚书，直接掌握官员的选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做到大公无私，实为难能可贵。

对于国事，徐勉尽心勤勉。梁武帝北伐时，军政大事十分繁忙。身为吏部重要官员的徐勉，因为文采出众，被任命为“参掌军书”。军政繁忙到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徐勉每次回来，家里的狗都把主人当成了陌生人对着他叫。他感叹说：“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

在徐勉生活的时代，他出淤泥而不染。百官经营牟利时，他不聚敛财富，只为了子孙留下清白；他始终坚持为国举贤任能，选官始终公正无私，任事忧国忘家，这些都是值得后世推崇的品质。



徐勉，字修仁，东海郡郿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南朝萧梁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在古代廉政文化史上，徐勉有两件事为人称道：其一，遗子孙以清白，其二，选官大公无私。

遗子孙以清白。据《梁书》中的徐勉列传记载，他曾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徐勉是吏部尚书，朝廷重臣，但他始终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也不想给子孙留下财富。在秦汉时期，土地可以私有，山林属国家所有，不允许私家占有山林湖泊，但到魏晋南北朝时，山川河泽都可私有。南朝刘宋时颁布的“占山格”第一次规定官员可以合法占有山水。至于土